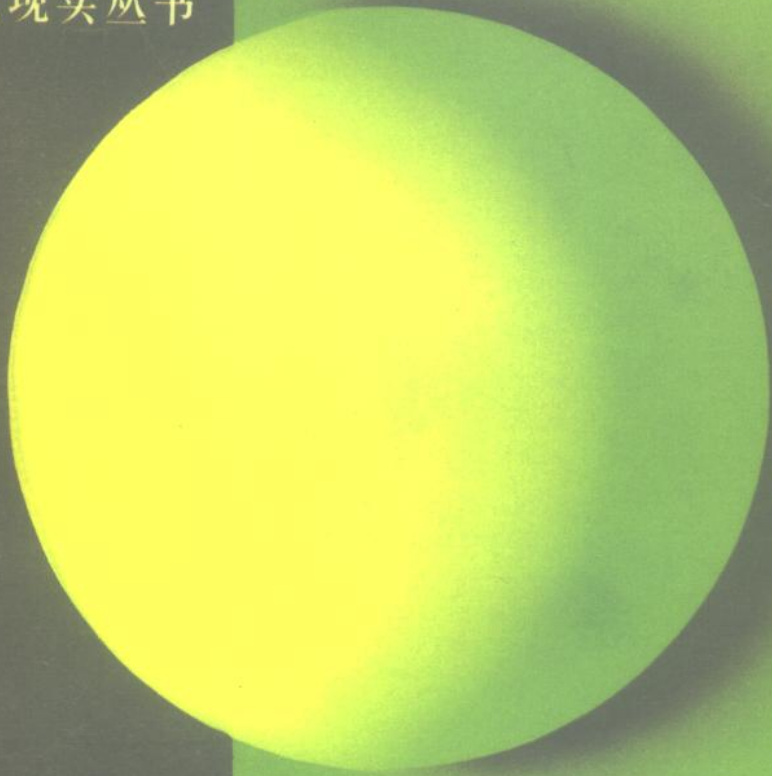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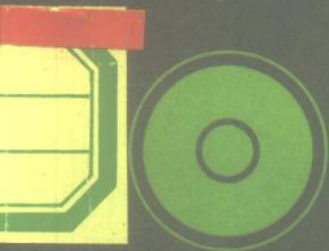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和
当代现实丛书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李乾亨 杨瑞龙

河北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河北人民出版社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李乾亨 杨瑞龙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11印张 267,000字 印数：1—10,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86·915 定价：2.65元

ISBN 7-202-00048-2/C·4

在丛书林立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这套学术理论丛书力求以对当代现实问题的严谨探索为特色。

马克思主义是在历史和科学的前进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中国和世界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一方面证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生命力,一方面要求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创造性地解决新问题。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新情况、新经验、

编者 前言

编者 前言

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同时要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只有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勇于突破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或不适合变化了的情况的判断和结论,而不是用僵化观念来裁判生活,马克思主义才能随着生活前进并指导生活前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方法研究当代现实,从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出发,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新时期我国理论工作的重心所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丛书将为此尽力。

她将着意寻求那些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

6288/2

史学、文化学等领域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从理论上提出问题、解答问题的作品。

她将着意寻求那些深入研究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新变化，视野开阔，勇于突破，富有启发性的作品。

她也将寻求那些材料充分，以理服人地评析当代西方各种有影响的理论思潮，具有独到见解的作品。

她还将外国学者（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问题的佳作纳入自己的视野，为我国理论工作者了解、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提供便利。

她注重学术著作的可读性，力求语言清新，文字洗练，材料扎实，观点鲜明。

马克思曾经把科学的入口处比作地狱的入口处，以此提醒科学工作者的探索勇气。自古及今，充满探索勇气的作品无不使人耳目一新，活跃人的思路，启迪人的智慧。理论研究中的见仁见智和自由争论，是走向真理的必由之路。我们的丛书，并不是要叙述什么绝对正确的东西，而只是反映对真理的探索和追寻。倘使她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理论工作者研究当代现实问题的水平，我们将十分满足。

丛书的组稿工作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热切希望能得到更多学者的帮助。对于所赐书稿，我们将不计作者名声之大小，年龄之老中青，一律视选题和书稿质量决定取舍。

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能奉献给读者有益的思想。衷心希望这些凝聚着作者辛勤探索心血的著作，能因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着现时代而具有长久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丛书编委会

1987年6月20日

前 言

发展和变革是当前世界的两大历史潮流。在社会主义各国，从东欧的巴尔干山麓、维斯杜拉河畔，到东海之滨，都可以听到这一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的声音。其中，在我们这个拥有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更是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历了八个年头。从农村到城市，从分配领域到生产领域、从宏观调控体系到微观经济基础、从管理体制到市场体系，全面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新旧体制的转换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商品经济发育度很低的国家里推行改革更是如此。8年改革，我们已突破了传统体制的框框，引入了市场机制，无论是微观经济基础，还是宏观控制机制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从总体上说，新的经济运行机制还不完善，还不足以支配整个社会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而旧的经济运行机制却以其强大的惯性和尚存的基础，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我国目前正处于新旧体制对峙的局面。由于新旧体制因素的内部摩擦，出现了一系列非正常的经济现象。如宏观失控、企业行为不合理、经济调节手段失灵等。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处于十字路口，是继续推进改革，还是维持双重体制的并存局面？是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还是强化指令性计划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选择什么途径通往目标模式？等等。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重大战略选择。

在这样关键的时刻，重温和研究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我国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共同的改革任务，他们的探索比我们早行一步。思想是无国界的。了解他们的改革理论，不仅有助于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渊源，而且可以通过研究改革理论的发展进程，为进一步推进我国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以更好地从理论上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目标模式。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沿着两条主线发展，形成了传统的苏联经济学和东欧经济学两大流派。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的发表，标志着传统的苏联经济学体系的完成。传统的苏联经济学主要具有以下特征：在所有制理论上，承认在社会主义的一定发展阶段上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他们把国家所有制等同于全民所有制，急于实现由集体所有制向国家所有制的过渡，排斥个体经济的存在；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总是从消极的眼光看待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十分强调指令性计划经济的作用，仍未摆脱计划和市场相互排斥的信条；在管理方式上，强调国家集中控制的作用，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而忽视如何赋予企业经营自主权、处理好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满足于运用、论证、解释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把西方经济学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否定其在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的可用性。苏联经济学把社会主义经济看成是无矛盾的均衡经济，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无矛盾的均衡分析法。在考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时，重视规范分析和定性分析，忽视实证分析和定量分析。传统的苏联经济学不仅在其理论发源地——苏联有广泛的市场，而且在所有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成为主流经济学，如民主德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前，在我国理论界占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学流派也是传统的苏联经济学。在苏联，曾有不少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多次向传统的经济理论发起挑战，如60年代的利别尔曼；近年来活跃于苏联经济论坛的西伯利亚学派等，曾震荡了传统经济学的根基。*但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的经济理论仍占居主导地位。近年来，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大力主张经济改革，苏联的理论界开始出现了活力，传统的苏联经济学中已注入了不少有关商品经济理论的新东西。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传统苏联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仍被保留着，其发展趋向还须继续观察。

1953年以前，苏联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各国可以说是一统天下，50年代以后，过去被正统经济学家斥之为“异端邪说”的经济理论有了较快的发展，一个新兴的东欧经济学流派异军突起，与传统的苏联经济学分庭抗礼。东欧经济学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而发展的。东欧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是波兰的著名经济学家兰格。他在与米塞斯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战中，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中央计划和竞争市场相结合的思想，初步建立了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导入市场机制的经济模式。在创立和完善东欧经济学的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卓越的经济学家，如南斯拉夫的基得里奇、卡德尔、科拉奇、马克西莫维奇、霍瓦特等，波兰的兰格、卡莱茨基、布鲁斯、泽林斯基等；匈牙利的科尔奈、涅尔什、奇柯什、里斯卡等；捷克斯洛伐克的锡克、考斯塔等；民主德国的贝伦斯、米塔格等。

东欧经济学经过大约35年的演变和发展，已初步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在某些东欧国家已取代传统苏联经济学，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流派。东欧经济学对我国的经济学界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东欧经济学主要具有以下特征：在研究对象上，以批判的态度考察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主张改革传统的苏联

模式，建立多样化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在理论分析中，不仅注重计量分析，成功地吧线性规划、控制论、系统论运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而且注重实证分析法。他们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灵魂，从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他们反对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看作仅仅是解释原则和宣传政策的学说，而应成为实证性的经验科学；在理论体系上，东欧经济学完全跳出了传统经济学的框框，它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主线，充分强调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的广泛调节作用。着重探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模式、宏观调控机制与微观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试图建立一个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理论发展上，东欧经济学与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息息相关，它为经济改革作理论论证，而体制改革的深入又为东欧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前景。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为改革大造舆论，并对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程序、战略选择等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因此东欧经济学避免了苏联经济学在研究上的纯理论性，而具有鲜明的对策性，即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经济学家直接从事改革方案的设计，根据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对策性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广泛采用实证分析法、计量分析法，而且采用非均衡分析法，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一个无矛盾的乌托邦，客观地描述和解释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各种对抗和摩擦，探寻根治各种病症的办法。同时在研究中，不仅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灵魂，而且批判地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东西，进行理论创新。

以上，就东欧经济学的共性作了一般性的概括，但由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中面临着不同的问题或具有不同的国情和历史条件，其理论发展具有鲜明的特点，东欧各国的理论具有较大的

差异性，如南斯拉夫的自理论论与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有很大的不同。另外，即使是在同一国家，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也存在着不少理论分歧，如匈牙利的科尔奈与里斯卡的理论就不尽相同。但不管怎样，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他们都有基本一致的认识，从而构成东欧经济学这一流派。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也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发展过程。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直接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干涉及繁重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促使苏联从革命胜利之日起，就牢牢地把决策权高度地集中在国家手里。斯大林的理论体系则为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的模式提供了理论证明，到本世纪50年代初期，传统的苏联经济模式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所有二次世界大战后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仿效苏联模式。应该承认，传统的苏联模式在革命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确实发挥了它的特有效力。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不相适应，成为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刻的经济原因。

50年代初，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首先向传统的苏联模式发出挑战，掀起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次浪潮，南共毫不留情地批判了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充分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和发挥市场机制调节功能的积极意义，全面推行工人自治制度，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南斯拉夫的改革对东欧各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进入60年代后，在东欧掀起了第二次改革浪潮。在这一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的理论界对苏联模式提出了批评，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把许多改革措施付诸实践，更大胆地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捷克已酝酿成了对传统体制大刀阔斧改革的方案。在要求改革的舆论中，苏联也提出了实行新经济体制的设想，迈出了改革的步伐。

后来因出现了1968年8月的“布拉格”事件，在苏联的干预下，一些东欧国家的改革步伐放慢了、甚至停滞或倒退了。但改革潮流并没完全逆转，匈牙利经过长期的准备，于1968年开始全面推行新的经济体制，如取消指令性计划，实行经济调节制度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三次浪潮是由我国掀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农村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农村改革触发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的公布，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构画了宏伟的蓝图。短短8年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已为世人所称道。在我国大规模推进改革的同时，匈牙利、南斯拉夫的改革还在继续向纵深发展。戈尔巴乔夫上任后，苏联也开始跻身于改革的行列。从戈尔巴乔夫的几个重要报告中可以看出，这次苏联的经济改革与以往改革相比，将会迈出更大的步伐。在这股巨大的改革浪潮推动下，其他东欧各国如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等都在跃跃欲试，准备推出相应的改革措施。

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传统的苏联模式除个别国家，如阿尔巴尼亚还在仿效外，其他长期实行该模式的国家，包括苏联在内都不同程度地引入了市场机制，决策权实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散化，企业的自主权有了扩大。传统的苏联模式已发生了变形。但由于思想认识、社会和历史背景、改革措施和步伐的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改革模式。第一种是以苏联为代表的改革模式。它在保持原有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的条件下实行改革，例如，不是取消指令性计划指标，而是如何完善指令性计划体制，还在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上兜圈子，改革给经济注入了活力，但改良式的措施使传统体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仍没有得到有效的克服；第二种是以匈牙利为代表的改革模式。该模式注重对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全面改革，如取消指令性计划，强化经济

杠杆的调节作用，扩大企业自主权，但没有相应地重新改造微观基础，仍基本保持传统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所有制结构。这不仅影响企业活力的发挥，也影响市场体系的完善。改革后的体制与传统体制相比，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由构想转变为现实。但由于新旧体制同时并存，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仍不能占居绝对的主导地位，直接行政干预减少了，而间接的行政干预增多了，出现了国营企业的双重依赖等一系列问题。这表明改革的任务仍很艰巨，要保卫改革成果，必须继续推进改革；第三种是以南斯拉夫为代表的改革模式。该模式全面否认传统的经济体制，决策权全面分散化，不仅重新改造管理体制，而且重新构造微观基础，取消国有制形式，实行工人自治，市场机制成为经济的主要调节者。它消除了传统体制的固有弊端，经济充满活力，但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如宏观失控，通货膨胀、失业率高；第四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改革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尽管因改革时间尚短，该模式尚未正式定型，但已显示出的巨大生命力和优越性引起了社会主义各国的广泛兴趣。

通过探讨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的演变过程，我们得到了以下启示：

首先，改革是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当今世界，从东方到西方，从北半球到南半球，改革浪潮日益高涨。从5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尽管时有起伏，但总趋势是不断向前推进的。改革所带来的优越性吸引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改革。西方国家自经历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后，也意识到市场体制并非尽善尽美，普遍推行了“凯恩斯革命”，强化了国家调节的作用。进入70年代后，凯恩斯学说又失灵了，于是新自由主义学派又活跃于社会舞台，并构成政府政策的一部分。当然，西方国家的改革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被动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则是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在共产党领导下，主动对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性质的环节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实践已证明，任何试图不根据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死抱一种固定不变的经济模式不放的观点都是有害的。旧的体制虽然从30年代到50年代，在社会主义各国都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也暴露了这种僵化模式的弊端。它不利于吸收当代最新科学技术和创造新的生产力。只有通过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邓小平在1987年4月26日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应坚持社会主义。但要进一步建设比资本主义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搞社会主义，但只有到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显而易见，坚持改革、开放是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根本途径。

其次，改革并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而是要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但改革模式的选择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具体国情，切忌照抄照搬某一理论模式或某一国家的改革模式，而应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实已证明，社会主义可以采取多种经济模式。然而，强调经济模式的多样化，并不排斥有用的汲取。这包括：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些汲取改革的基本原则，当然这并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二是以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理论和实践中汲取他们的有益成果和经验教训，以便选择更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和确定具体的改革方案、改革步骤，避免走弯路；三是从西方国家经济模式中汲取对社会主义有用的某些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因此与社会化大生产和商品经济共

性相联系的某些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经营管理方式，这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东西，经过改造仍可为社会主义国家所用。如金融机构体系、股份公司形式、企业管理等某些方式。

再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其实质就是要对原有经济体制模式进行根本性改造。传统的经济体制积弊很深，任何枝节性的改良都不足以彻底消除这些弊端。苏联等国多次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但由于基本保留了传统体制的运行机制，在某些环节注入的新经济因素很快为旧体制因素所同化，或改革效果远远低于改革设计者的预期愿望，从而出现了进进退退的现象。因此，只有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关系的环节和方面”^①实行全面改革，才可能实现模式转换。为此就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改革方案。这一改革方案既是高瞻远瞩的，又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充分估计每一个步骤所产生的各种后果，趋利避害，经过实践检验，使改革方案逐步完善。改革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试图不经曲折、一蹴而就顺利地实现模式转换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在改革过程中，或长或短地会经历一个双重体制并存的时期，新旧体制因素的内部磨擦及旧的习惯势力时刻有把经济体制拉回到旧的运行轨道的危险。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坚定改革的信念，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消除改革中的各种阻力因素，选择最佳的改革战略，使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尽快占居主导地位。

最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体系，它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科学的进步而更加丰富多采。死抱住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当作教条的人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不断根据客观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答实际问题，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东欧的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

^① 引自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主义有深刻的研究，但并不是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又都深谙西方经济学，批判地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以此加深自己理论分析的深度。东欧各国的改革实践又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就可以背靠马列主义，汲取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东西，就改革实践出现的问题，给予理论上的说明，提出改革对策，进行理论创新。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日益丰富、不断发展，更有生命力。

我们这本书是在给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美国研究生讲授和辅导“中国经济结构和发展”课程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本书中，着重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比较深入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各国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经济改革理论，注意理论模式之间的比较，并适当地加以评述，以便发现我国经济理论与苏联东欧各国经济理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养料。我们也比较全面地叙述了具有典型意义的苏联、匈牙利、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尤其重视各国目前在改革中面临的新问题及采取的新的改革措施，探索其改革的发展趋向。尽可能客观地叙述苏联东欧各国的改革经验和教训，以便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所借鉴。在此基础上，我们在最后一篇中集中探索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就我国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及改革战略的选择提出我们自己的看法。需要说明的是，评判苏联东欧经济学家经济理论的正确与否的主要标准还是他们本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他们的理论毕竟是植根于他们本国的土壤，反映了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的特点。他们的理论可为我国所借鉴，但不能照搬照抄。同理，苏联东欧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的最好总结者是他们本国的人民，不负责任的妄加评论或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做法都是不足取的，但这并不影响实事求是的探讨，

以便使别国的改革实践成为本国推进改革的一面镜子，避免再走不必要的弯路。

集众家之说，抒一己之见，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我们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这一书稿，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我国经济学界已作出的理论探讨，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虽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今后的道路还很漫长，任务还很艰巨。我们愿以一得之见，贡献于亿万探索者之前。不当之处，敬希读者指教。

李乾亨 杨瑞龙

1987年6月

《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现实》丛书

特邀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邢贲思 宋 涛 陶大镛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卫兴华 王 于 王 东 王锐生

何君康 胡代光 项启源 赵家祥

黄达强 蔡声宁 魏 坝

本社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许爱仙 张 驰 李保平 何瑞桐